

论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

王雨辰

摘 要 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是对当代世界发展理念和发展现实反思的结果,强调必须转换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和绿色发展;习近平创新驱动发展观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动能和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其目的是通过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始终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评价发展四个问题展开探讨,在新发展理念中具有基础和核心地位,是超越西方发展理论的新型发展理论,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创新驱动发展观;新发展理念;西方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6-00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18VSJ013)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同时又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发展依然看作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基于以上判断,习近平提出了应当树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创新驱动的发展观,并将此作为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战略目标。科学剖析习近平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创新驱动发展观是对发展理念和发展现实反思的结果

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可以说是习近平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就探讨和反思了当代西方发展观演进的历程,并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我们既要 GDP 又要绿色 GDP 的主张。在他看来,“二战”后,由于发展经济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以追求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应运而生。在这种“增长第一”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1](P19)。人们由此对上述“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展开了反思,相继提出了重视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重视人的精神需要、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发展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习近平在肯定上述发展观的价值的时候,又指出“这些发展理论还是不系统、不完善的,有许多是基于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的,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1](P20)。习近平进入中央工作后,特别是担任总书记以后,在剖析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创新驱动发展观。

在习近平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2](P120)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瞄准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追求更好的发展。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P4)传统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和向往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转换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和绿色低碳发展。

习近平强调,树立何种发展理念对于如何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表现”^[3](P197)。正因为发展理念对于引领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反复强调,应当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逐步变革原有的发展理念。由于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带来了诸如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和生态资源制约严重、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升、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新的发展理念的树立应当立足于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来展开。根据以上问题,习近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的内容既具有对我国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针对性,同时又是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具体说:

第一,创新发展针对的主要是如何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通过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但受当前国际、国内条件的制约,这种发展方式不仅缺乏内在的动力,而且难以为继。如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科技不仅对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决定了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能否获得优势。因此,“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3](P198)。

第二,协调发展针对的是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的我国区域和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应该说,如何实现协调发展一直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先后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应该遵循统筹兼顾和“十个指头弹钢琴”的辩证思维方法;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和“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注重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建设、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提出了注重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过渡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协调发展挖掘发展潜力,化解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习近平强调,在当前的新阶段,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注重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第三,绿色发展针对的是粗放型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生态后果,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成绩,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就决定了“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P209)。人类的活动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必然会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实现绿色发展,从而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第四,开放发展针对的是如何处理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提出开放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是因为这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密切相关。习近平通过考察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后,一方面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问题。在习近平看来,经济全球化主要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形成的平行市场和世界各国经济高度依存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作过系统分析,主要是西方国家依靠强力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形成的两个平行的市场;第三个阶段则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只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并加入其中,才能发展壮大自己。习近平指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当前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虽然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但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具有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而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依然严重。目前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的改革开放正从早期的以引进为主向当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转换;我们现有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还难以满足我国展开高水平的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必须用开放的心态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就,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正确处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

第五,共享发展针对的主要是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即发展的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从西方发展理论的演变看,为了解决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文化价值观断裂等问题,应该认识到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强调发展除了包含经济增长,还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因此,“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4](P46)。以此为基础,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并先后经历了从单纯经济增长战略到基本需求战略、边增长边分配战略、公平增长战略等发展战略的转变,充分反映了对发展成果如何进行分配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P214)。实现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是中国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分配不公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发展的整体性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发展方式的转换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发展的国内和国际市场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分配问题。以此为基础,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创新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只有把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与核心地位上,才能真正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

二、习近平创新驱动发展观的地位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习近平看来,之所以要把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既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密切相关,也是当前我国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看,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这里所说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和突出。创新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也关系到能否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3](P203)正因为创新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3](P203)。从我国应对发展环境的变化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应该看到,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产业结构扭曲、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的约束,而且我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挑战。要回应上述挑战,只有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到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转换,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2](P12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创新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不改变,就无法有效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3](P267)。

科学技术创新在世界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中,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导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决定着能否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决定着我们能否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就决定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就是要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由于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拘泥于创新链条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而必须坚持整体和全面的创新观。把这种整体性的创新观具体落实到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必然会涉及如何处理科技创新与国家需要、科技创新和人民的需要、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与创新主体的关系、科技创新与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的培育等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了上述关系问题,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并使科技创新真正实现其目的。具体说:

第一,从科技创新与国家 and 人民需要的关系看,科技创新要求满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推动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实践和人类的需要。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P668)。以此为基础,习近平在反思近代以来我国不注重将科学技术与社会需要相结合造成被动挨打的教训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2](P125)。习近平由此指出,应当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现实,强化科技创新的战略导向,把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战略需要上。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载体的新产业上。只有实现了这些新技术的创新,才能够使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

化、智能化转变,从而大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这些不仅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且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战略需要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且也决定了我国科技创新突破口以及技术创新的着力点。

第二,从科技创新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看,科技创新只有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只有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真正实现其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要素投入型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协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难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有效地化解上述难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而且能够使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和绿色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第三,从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看,既有科技体制的束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阻碍要素之一,这就决定了深化改革、建立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必要性。在习近平看来,虽然当前我国展开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和硬件设备已取得较大的改善,但作为科技创新的软件的科技管理体制不仅存在着部门条块分割、相对封闭和无法有效协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的缺陷,而且现行科研管理体制缺乏对创新者的保护和激励机制,无法使科技创新成果有效地转换成现实生产力。这就决定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紧迫的条件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1)。通过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思想和体制的障碍,最终建立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四,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创新主体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不同创新主体,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在习近平看来,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和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主体,只有合理运用政府和市场的功能,才能真正发挥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从政府的功能看,主要在于要重点扶持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关于基础性学科、前沿性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使具有一定现实目标导向的应用性研究和自由探索的研究有机结合,夯实科技创新的基础,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从市场的功能看,主要是在强化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同时,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性,使科技创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形成各种创新主体有机互动的创新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国家强的通道,提升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第五,从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创新精神培育的关系看,人才是能否展开科技创新的关键,这就决定了能否实现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有没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6](P110-111)我国的科技队伍虽然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其中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水平不足、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世界级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通过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建立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才队伍。打造创新人才队伍除了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科教融合、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之外,最为核心的则是对创新精神的培育。这就要求我们在尊重科学发现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思想束缚和管理科研人员,对科学问题上的不同学说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6](P120)。

在习近平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科技人才队伍,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使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发挥,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基础和前提。

三、习近平创新驱动发展观的理论特质和当代价值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导的创新发展不仅决定了能否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而且也决定了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它是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与核心。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是超越了西方的发展理论和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科学指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习近平首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阐明了为什么只有创新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什么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从国际的维度看,世界经济增长正处于动能的换挡期,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减弱,加上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降低,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加剧,世界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要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的争论,树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3](P480),只有通过创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才能化解经济增长中遇到的问题,培育新的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内的维度看,由于我国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当前我国的经济一方面已进入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另一方面靠资源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受生态资源、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制约已难以为继。“‘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3](P245)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彻底抛弃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旧有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要追求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那种“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3](P254)。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转换原有的发展方式,代之以可持续、协调的发展,而且还应当调整产业结构,去除低端落后的产能,立足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来追求发展,这一切都必须以创新发展为基础。因而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来阐明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学派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供给学派是为了解决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失败导致西方经济发展“滞胀”的困境而提出的,其理论核心是强调供给会自动制造需求。由此他们提出通过减税来增加人们的需求,其特点是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结构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在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一种有效的张力,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又注重生产关系的调整,力图把市场和政府的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它的重点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化解过剩和无效产能,促进产业升级,而这一切都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基础。这就意味着“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3](P256)。

要真正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必须首先坚持创新发展,这凸显了坚持创新发展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粗放型发展方式与长期奉行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这种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造成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如何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化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习近平看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供给如何通过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使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如何从相对饱和的传统

产业投资转向基础建设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品、新产业展开创新投资;伴随着我国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与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存,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支撑作用;如何利用新技术发展新产业,通过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合理协调供求关系;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减少,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不复存在,如何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与进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已经取代数量型和价格性竞争,如何科学把握市场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和实现供给的创新,从而为市场的完全充分竞争提供条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强烈的矛盾,客观上要求我们应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代替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如何通过创新发展,标本兼治,防止经济高速发展下掩盖的地方性债务等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边际效率明显递减的环境下,如何把握市场总供求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上述新变化、新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原有的高速发展时代的结束和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面对新变化和新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和协调的发展来解决。无论是转换粗放型发展方式,还是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都必须以创新发展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基础和前提,创新发展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发展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超越了西方发展理论的新型发展理论。西方的发展理论是根据西方现代化经验为“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设计发展道路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先后经历了现代化理论、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阶段。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所谓现代化无非就是从传统性过渡到现代性,但他们所讲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性质,传统性就是落后国家所具有的性质,这实际上是把现代化看作落后国家否定本国的传统,全盘西化。他们进一步把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归结为通过投入资金和技术,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在现代化理论那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现代化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把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学者雷迅马对此指出:“现代化理论远远不只是一套被用来产生特定结果的分析性和操作性的工具。它也是一种在各种相互强化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形态。”^[7] (P113) 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实践虽然给落后国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也出现了经济结构畸形与经济效率低下、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严重、外债加剧、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断裂等“有增长而无发展”现象。人们通过反思这一现象,认识到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由此人们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将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自身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过程。但是,这一理论虽然比较注重社会系统内部诸要素的交互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它却较少关注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基于此人们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提出需要和限制这两个重要的概念来保证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这里所讲需要的概念,主要是指发展应当把满足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限制概念,则是要求根据对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限制。但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混淆了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的确使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呈现不断增多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的同时,却又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因为全球化进程是由资本所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借助它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利益远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人类的一种发展理想不仅难以真正落实到人类实践活动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应当以人类长远利益,特别是要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为基础。但我们存在着无法判定后代人的需求偏好、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义务不对等以及在后代人缺席的当前如何保证后代人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谈论后代人的利益必然流于抽象和空谈。

而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却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的上述缺陷,这是因为:

在习近平看来,发展既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搞清四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1](P22)习近平所提出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创新驱动发展观系统地回答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具体说:第一,他是通过阐明什么是“真发展”来阐明什么是发展的。在习近平看来,西方发展理论追求的是以资本追求利润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不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的发展不是“真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只能导致放任资本追求利益,最终形成有违公平正义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结局,真正的发展应当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发展。第二,习近平是通过分析国情来论述“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的。在他看来,改革开放虽然使我国社会经济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发展不仅是党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也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3](P234)。可见,习近平是依据中国的国情而强调必须要追求发展,只不过当前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规模型的发展,更是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发展。第三,对于“怎么发展”这一问题,习近平根据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摒弃以资源和人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创新发展。在习近平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这就决定了必须首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问题。由于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创新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能力,不仅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而且能够极大地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要素投入型发展方式又造成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习近平坚决反对继续坚持以要素投入为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不协调的发展,而要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好发展”,即创新驱动发展。在“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上,西方发展理论或者脱离后发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把发展单纯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长,造成了一系列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或者只注重发展进程中社会系统各因素的相互关系,忽略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辩证关系;或者脱离现实抽象地谈论可持续发展,而无法使理论真正落到实处。习近平尤其重视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尤其重视发展进程中维系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超越了西方发展理论,习近平的发展观是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指南。第四,对于“如何评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主要用是否实现协调发展和是否以人民需要为中心来评价发展。在习近平看来,协调发展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又是评价发展的尺度和标准。从发展手段上看,就是要坚持发展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从发展的评价尺度和标准看,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关系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系到发展能否做到可持续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决定了发展既要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推进发展的主体,同时发展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福祉,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基本原则。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只有依靠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来保障,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

“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P96)。

习近平正是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面超越西方的发展理论,立足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观,把创新发展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能,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来代替粗放型发展方式,追求并努力实现协调、绿色、可持续和共享发展,以实现通过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 [4] 杜德利·西尔斯. 发展的含义 // 亨廷顿.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张景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7] 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牛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Xi Jinping'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Wang Yuc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President Xi's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re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core of this development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and its purpose is to meet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by realizing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has always focused on four questions: what is development, why we need development, how to develop and how to evaluate development. It has a basic and core position in the new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and it is a new development theory which transcends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as well as a scientific guid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 收稿日期 2018-08-11

■ 作者简介 王雨辰, 哲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湖北 武汉 430073。

■ 责任编辑 涂文迁